

屠格涅夫选集

罗亭



屠格涅夫选集

罗 亭

磊 然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〇 年 · 北 京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屠格涅夫
十二卷集》第二卷译出。

责任编辑：张福生

罗 亭

luo t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18,000 开本850×1163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4}$ 插页6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200

ISBN 7-02-000989-1/I·944 定价 3.00元

译 本 序

在回忆《罗亭》一书问世时，安年科夫称它为“社会小说”，并且说，这种小说使它的作者“变成了政治活动家”。他认为，在该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历史性的人物，这人物很久以来就以自己的勇于否定、从事宣传的性格引起作者本人和俄国社会的注意了。”安年科夫是屠格涅夫的挚友，他是了解屠格涅夫的创作意图的。屠格涅夫自己也谈到《罗亭》和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联系。在《长篇小说总序》中他特地指出，《罗亭》“是在克里米亚战争达到高潮时”写成的。

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战争的失败暴露出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和腐败，使举国上下深感改革的必要。当时即位的新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宣告准备农奴制改革。俄国社会各阶层都在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都在探索能够改造俄国的力量。在《罗亭》中屠格涅夫正是要对贵族知识分子在前一时期的活动作出客观评价，并且阐明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如何发生作用的问题。

罗亭的原型主要是巴枯宁。在当时他是西欧派中的激进分子。据说，作者最初曾用最灿烂的色彩写这个人物，并安排了一个光荣的结局。快要写完的时候，作家考虑到，如此光用一种明亮的色调来写主人公，他将被誉为不了解人物的心理。于是反复修改，一度曾使罗亭变成了一个“吹牛家，伪君子，骗

子手”。后来接受了友人鲍特金的意见，又作了重大的改动，写成了定稿。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文本。

苏联研究界根据手稿等可靠的材料断言：《罗亭》的写作经过三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阶段，据说在这个阶段增加了三个重要部分。首先是罗亭在与皮加索夫舌战之后的“即兴”谈话，这段充满诗意和激情的文字是对罗亭的“辩才的音乐”的赞赏；而他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传说的转述则表达了他的崇高的憧憬，他的人生使命的理想。其次是第六章中列日涅夫谈到的波科尔斯基的莫斯科小组的故事。下文将会谈到，这个波科尔斯基是以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莫斯科哲学小组的领袖斯坦凯维奇为原型的。把罗亭和这个小组相联系，也就使他成为半历史性的社会活动家。最后是第十二章中列日涅夫关于罗亭的总结性评语，他虽然批评罗亭的世界主义，说他不了解俄国，却充分肯定罗亭的热情及其宣传的意义。增加了这三个部分，既使罗亭增添了理想的光辉，又肯定了他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社会活动的意义。

这次增改虽则是听从鲍特金的忠告，而就改动的内容来看，则是完全符合当时屠格涅夫的思想倾向的。正是在国家面临重大转折、平民知识分子崭露头角的时候，屠格涅夫在《罗亭》中，不再像自己过去的作品如《多余人的日记》中那样，限于揭露贵族知识分子——“多余的人”的弱点，而是在批评他们的言行脱节的同时，赞扬他们的活动的历史作用了。耐人深思的是，就在《罗亭》发表的一八五六年，列·托尔斯泰准备撰写《十二月党人》，旨在说明“俄国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贵族在文学和社会活动中，以言论和行动为农奴解放作了准备，并因此被流放或处绞刑”。两位作家的意图是近似的。一是缅怀贵族的功勋，一

是追溯贵族知识分子的业绩。他们都回到历史的过去，分别回到二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当时正是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时期，在社会运动中优秀的贵族还能起进步的作用，因此，在所描写的范围内，都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罗亭》中的次要人物并不复杂，无须一一分析，这里只想集中地谈谈主人公的性格。

罗亭是一个小贵族。当他初次出现于拉松斯卡娅的沙龙时，这位衣着平常、姓氏不见经传的人物，颇为女主人所轻视。她甚至没有问他父名。他才思敏捷，辩才无碍，能够抓住事情的本质，善于击中论敌的要害，很快就以战胜皮加索夫而赢得满座的青睐。不过，他使娜塔利娅和巴西斯托夫为之倾心的，还在于他相信科学和知识，热爱真理和理想。他的即兴谈话，不仅是“灵感的喘息”，而且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表达了他所憧憬的短暂人生的永恒意义。他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和微不足道的；然而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这些崇高力量的工具，这种想法就应该能替代其他种种的快乐……”正是这些崇高的思想追求深深打动了娜塔利娅的纯真的少女的心。

罗亭成了拉松斯卡娅的座上客。在与女主人的谈话中，他应对得体。对她的自我吹嘘，没有曲意奉承，显示了独立的人格。他与娜塔利娅谈爱，表现出主动性，甚至可以说是步步进逼。他先是暗示她说：橡树只有在新叶开始萌发的时候，旧叶才会脱落；后来又要求她与他单独会见，迫使她说出自己爱他的心底话。这些都显示了他的勇敢而不是怯懦。而且这也出于真诚的爱情。可是，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不切实际而又

没有行动能力的人。爱情对他说来是诗意的东西。他谈爱，并没有想到应该如何去实现，也许没有想到应该使爱情得到实现，更没有预料到它要受到的阻力，又是如何加以克服。当事情停留在语言上的时候，他一切得心应手；而当必须行动的时候，他就束手无策了。于是我们的罗密欧变成了哈姆莱特。尽管娜塔利娅暗暗下定决心，愿意不惜牺牲一切追随他，他却只是退缩，甘心“屈服”。这当然来自他的性格软弱，却也由于他正直而不自私。他说得对：“如果我不是以一片最忠诚的爱来爱您，我会立即主动提出要您跟我私奔”。

罗亭是坚决反对自私的，但他却强调自尊。在他认为自己获得娜塔利娅的爱情时，特地向沃伦采夫表示歉意，以此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给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写告别信，也出于自尊心而要为自己辩解。她离开他使他最痛苦的，与其说是爱情的失败，不如说是他在她心目中地位的贬低。他在给她的信里说：“我给您留下一个比我应得的更坏的记忆，是十分痛苦的。”也许正因如此，当时一位批评家说：“罗亭身上有一种热忱，但也有一种冷漠无情，只是这种无情是在血液中，而不在头脑里。”这大概就是说，罗亭在理智上是热情的，在感情上是冷漠的。不过，罗亭的自尊心却有积极的意义，它推动他献身理想，颇使人想起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提倡的“合理的利己主义”。

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似乎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像这样的朱丽叶愿离家出走，罗密欧却逡巡退避的故事，据说在当时俄国文学中不乏先例。但是，罗亭并不像果戈理的一个喜剧中那个逃婚的角色。通过他，屠格涅夫要表现的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人物。爱情的波折只不过是检验人物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种手段。小说中写到罗亭参

加波科尔斯基小组的活动。波科尔斯基的原型主要是斯坦凯维奇(部分地是别林斯基)。他所领导的这个小组醉心于黑格尔哲学,在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起过启蒙作用。罗亭之所以善于把握诸现象的联系、合理的必然性的规律,正得力于黑格尔哲学。作为这个小组的积极成员,他热情地宣传过进步的哲学思想,“在青年们的心里播下许多良好的种子”,而现在爱情上的退却,正好暴露出他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而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对当时很多贵族知识分子是很典型的,例如当时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德鲁日宁就认为,我们之间有很多罗亭。

通常认为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性格是静止不变的,而罗亭的性格,依我看来是有发展的。他出场时已三十五岁。如果说他在青年时同一个法国女子的交往近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那么他同娜塔利娅的关系应该说是真正的爱情。他毕竟有了一些生活阅历。但就是现在,他仍然缺乏毅力,言行脱节,同时又厌倦生活,有点颓唐。在上文提到过的给娜塔利娅告别的信中,他说自己在这次考验之后也许会变得较坚强些。这不是一句空话。几年之后,在尾声中,他连续从事各种改革活动,虽不能说百折不挠,却也是再接再厉。他还能勇于自责,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因挫折而抛弃理想,坚持“为思想服务”。

屠格涅夫在论文《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中贬抑后者而赞许前者。在他看来,哈姆莱特的缺点不只在于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主要是在于他是利己主义者,为自己而活着,不关心自己的责任,而只关心自己的境遇。而堂吉诃德的优点则首先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甘心困苦以至牺牲生命”,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为思想服务的人”,罗亭身上不乏

哈姆莱特的成份，却与自私无缘。他忠于理想，为崇高事业而奔走而献身，很像堂吉珂德。屠格涅夫让他死于快要陷落的街垒上，手中握着缺锋的马刀，正好表现了不务实际而又甘于牺牲的堂吉珂德精神。

评论界往往认为，罗亭的性格中存在着矛盾，似乎是由于作者的反复修改所致。作者的同时代的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甚至断言，屠格涅夫对罗亭以批判开始而以崇拜结束。其实，罗亭的信奉理想是前后一致的，在这方面他也确是言行一致的。不过，正如当时批评家谢·阿克萨科夫说的，屠格涅夫是兼写罗亭的优点与缺点的。而这些优缺点并没有破坏形象的完整性。的确，列日涅夫（在第五、六章中）的回忆给罗亭形象涂上了阴暗的色彩，但这里也包含着对罗亭的肯定，何况他后来自己承认，当时贬抑罗亭是怀有醋意，怕罗亭迷住了他的意中人，后来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

在《罗亭》中，屠格涅夫表现了鲜明的倾向性：既以贵族自由主义者列日涅夫来批评贵族中有革命倾向的罗亭，说他是“世界主义者”；又因鉴于新一代趋向于不同目标，而要求罗亭和列日涅夫等贵族知识分子“紧紧地彼此靠拢”。但是，作为“客观的”作家，他的小说始终令我们感到，热爱真理、漂泊天涯的罗亭远远高于胸无壮志、只讲实际的列日涅夫；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罗亭并没有真正和列日涅夫们团结在一起。相反，在尾声中，我们看到他们两人的鲜明对照。罗亭出场时说，人应成为“崇高力量的工具”，后来他终身潦倒，到处飘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奔走。人应作为“崇高力量的工具”还是为了自身舒适的生存？罗亭选择了前者，列日涅夫选择了后者。温饱或是饥寒，安乐窝或是仆仆风尘，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目标带来

的两种不同的归宿。“愿上帝保佑天下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句抒情插话，表明了作家的深切同情是在罗亭一边。

像罗亭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是“多余的人”？这个问题近年来颇有争议。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罗亭信仰科学和真理，始终热情宣传，从事各种改革，而最后又是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毋须否认，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并不改变他是一个“多余的人”，问题在于应该具体分析：应该如何看待“多余的人”，应该弄清罗亭又是怎样的一个“多余的人”？

说罗亭是“多余的人”的，始于这个形象诞生之初，而不是我们：“多余的人”在俄国文学中是一个大家族，只是他们间颇不相同。赫尔岑曾认为，应该明确地区别“过去”的“多余的人”同“现在”的“多余的人”。前者是“无辜的罪人”，后者则是“慌慌张张、神经衰弱的年轻人，在实际工作的压力下惊慌失措，指望毫不费力地解决困难并找到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在“现在”，奥涅金和毕巧林蜕化成为奥勃洛莫夫。显然，他是把罗亭看作过去的“多余的人”的。在这些“过去”的“多余的人”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又作了区分。他说：奥涅金受到社会宠爱，放纵而空虚；毕巧林关心个人享受，活着只为自己的情欲；别尔托夫也只沉湎幻想，无所作为。只有罗亭完全忘我，醉心于公众的利益，不倦地工作，为自己的思想而活着。也就是说，罗亭远远超过其他的“多余的人”。

为什么罗亭在当时社会里成为“多余的人”呢？屠格涅夫的同时代的批评家德鲁日宁认为，是因为他与社会不和谐。他以此责备罗亭，实际上这却是最好的肯定。人与社会和谐与否，其价值是视社会的性质而定的。罗亭所处的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统

治下的黑暗的社会。他虽则没有同社会公然对抗，但却格格不入，更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既不同于潘达列夫斯基的阿谀成性，沃伦采夫的庸庸碌碌，也不同于列日涅夫，这位看似孤僻傲慢实则安于现状的绅士。罗亭甚至也不同于娜塔利娅——这位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固然以行动坚决而高出罗亭，后来却毫不踌躇地与鄙俗的环境妥协了，而罗亭却始终不为这个环境所战胜。列日涅夫说，罗亭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令人辛酸而痛苦的命运”。“命运”就是所遭遇的客观环境，因此也就是说他生不逢辰。这也就是说，罗亭之成为“多余的人”，原因在于社会。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列日涅夫还说过，以罗亭的能力，什么地位，什么财富都会到手。但是罗亭在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中，总是受到掣肘，总是被迫离开。这是因为他心中燃烧着热爱真理的烈火，不愿“在不好的土地上扎根”，宁愿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不同所有一切妥协”，也就是不愿同社会“和谐”。

高尔基曾推许罗亭是当时所需要的“理想家”、“革命思想的宣传者”，并认为在那个时代是“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更有用处的人物”。不过，作为一个热情的宣传家，罗亭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应该向谁宣传，谁是自己的宣传对象。例如，他没有注意到巴西斯托夫那么向往他所宣传的理想，只有在快要离开之前，为了排遣愁绪、找他谈心时，才发现这个热情的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而这个巴西斯托夫，正是新一代，即平民知识分子，是贵族知识分子罗亭的后继者。可见罗亭还是不自觉的宣传者。但他的努力没有落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断言，新一代之所以能够向前迈进一步，“只是因为他们的先驱者（即奥涅金、毕巧林、尤其是罗亭等人）的斗争已为他们铺平了道路，扫清了道

路”。他还把这些“先驱者”称为“导师”。杜勃罗留波夫也在承认罗亭是“多余的人”的同时，肯定他们“把一些新的思想灌输到某一个圈子中去”，“他们是启蒙者、宣传家”，“他们在当时是人们所需要的”。无疑的是，在俄国文学中所有的“多余的人”中，罗亭是最出色的宣传家，最有资格被称为“新一代”的“先驱者”和“导师”。

因此，我认为，问题不在于罗亭是不是“多余的人”，问题在于，他是怎样的“多余的人”。

屠格涅夫自承没有“史诗意义上的才华”，但却被称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外国名作家交口称许他的工于“选择”，赞扬他的作品的无比“精致”。他自己也说过：“……谁要是表现一切细节，那就糟了；应该善于抓住有代表性的细节。才华，甚至所谓的创造也就在此。”实际上他的选择并不限于细节，他在一切方面严格选择必要的东西，删汰任何的杂质，从而达到“精致”。可以说，他的诗学的理想是经济。《罗亭》在这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头一部长篇小说。由于没有经验，在写作时他确实是“全力以赴”。他说：“对于我（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像这部作品那样努力和惨淡经营。”作为艰苦劳动的结晶，《罗亭》在许多方面成为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模式。

小说使用单线索的结构，而且特别集中。主人公不仅是全书的中心，而且是小说的轴心：一切人物或情节都由它幅射出来，并且都是为它服务的。主人公在第三章出场后，一切人物或情节须臾不离地围绕着他，不是罗亭自己在活动，就是人们在议论他。在他出现前的第一、二章里，通过利平娜的看望老

农妇的病，展现了主人公所生活的悲惨的农奴制时代的缩影；描写拉松斯卡娅则是安排他将在其中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提供烘托罗亭性格的各式人物。比如说，要是不先描绘皮加索夫的能言善辩，就不可能在第三章中一下子就显出罗亭的雄辩才能。在全书中，没有旁生的枝节，没有复杂的情节，没有繁多的波折，像梧桐那样亭亭玉立，不枝不蔓。

一般小说开卷时，人物总是在自己日常生活的圈子里活动，开端常常在主人公发生意外或特殊事件的时刻。例如《安娜·卡列宁娜》是从奥布朗斯基夫妇不睦，安娜来到莫斯科时开端，《复活》是从聂赫留朵夫出席法庭，遇到玛斯洛娃时开端。《罗亭》则不是这样。作家让主人公落入陌生的环境，后者同周围的冲突马上展开，小说直接由此开端。

如果说长篇小说一般反映主人公的一生，但所截取的也只能是他的生活若干片段；那么《罗亭》则只撷取主人公一生中心灵强烈表现的几个时刻。小说从第一章到尾声，时间的跨度是好几年，书中具体写到的却只有九天，而主要集中在六天内：第一天罗亭出现于拉松斯卡娅的沙龙，和皮加索夫辩论；第二天他先后和女主人及娜塔利娅谈话；两个月后头一天和第二天他向娜塔利娅两次表白；几年以后的一天列日涅夫等谈论罗亭的性格；罗亭在边远省份的行踪；又几年后的一天列日涅夫和罗亭在某省会旅馆的邂逅。整个小说像由几个点构成的虚线。有些评论家以此诟病《罗亭》，说它似乎是由几个中篇凑合而成。而这未始不是屠格涅夫的艺术上的独创。他所致力的是能够刻画主人公性格的几个场面，其余次要的、无关紧要的都放在幕后进行。

《罗亭》还很少日常生活的描写，绝没有像巴尔扎克那样细

致入微地描绘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它很像布莱希特的舞台，极少布景和道具。

笔墨的经济也表现在性格的刻画上。小说只把主人公放在聚光灯下，其余的人物只有当他有助于表现主人公性格时才被灯光照亮。对于主人公，不仅限于描写其心灵强烈表现的几个时刻，也不仅限于描写其有代表性的几个特点，就是这些特点也只通过某种行动或某个场面以寥寥几笔勾勒出来，但他并不因此显得单薄。因为小说还通过周围人物的眼光，从各方面展示他的某些特点，而这些人物同时又以自己的个性特点来烘托或反衬主人公的性格。因此，罗亭虽则着墨无多，却没有成为扁平的形象。

通常认为，屠格涅夫只能刻画同他气质相近的人物的内心生活，因此他笔下的英沙罗夫和巴扎罗夫的内心世界对读者来说是封闭的。罗亭无疑具有作者的某些气质，但我们也几乎没有看到他的心理过程。这并非因为作家不能表现这种过程，在《罗亭》之前，作家在一些中篇里已经显示出这方面的才能。只是在《罗亭》中没有加以使用罢了。尽管如此，罗亭的心理变化，从他的言词和行动中还是清晰可见的。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曾拟改编《罗亭》，把它搬上舞台，屠格涅夫坚决反对，理由是，《罗亭》是“心理”小说，不宜上演。看来是因为小说主要写思想意识上的活动，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

从人物语言来说，《罗亭》也很简练。罗亭是健谈家，但正如苏联批评家巴丘托说的，如果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相比，也还显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听任沙石俱下，而屠格涅夫则总是披沙拣金。凭藉简洁的语言刻画出令人信服的“说话的巨人”的形象，确是非同寻常的艺术。顺便

谈谈,罗亭的语言是颇有特色的。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信徒,他的语言显示出严密的逻辑思维,但却以充满比喻,显得生动而富于形象性。大家知道,屠格涅夫在大学念书和留学德国时,都曾专攻哲学,却又是擅长形象思维的艺术家。罗亭的语言正显示了作者两方面的特长。

《罗亭》全书译成中文只有十多万字,篇幅不大,容量不少。它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既代表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缺点,对五十年代的许多贵族知识分子也有典型意义。这个形象还同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一些人物形象一起成为“普通名词”:正像人们以奥赛罗代表忌妒,哈姆莱特代表优柔寡断一样,罗亭几乎成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屠格涅夫说自己在各部长篇中描绘文化界的面貌。在这个小说中,除罗亭外,不止列日涅夫、皮加索夫、潘达列夫斯基、巴西斯托夫,就是拉松斯卡娅,也同样属于文化界人士。据她自己说,二十五年来她为名流所倾倒。她的沙龙正好是俄国十九世纪前期文化人在乡村中活动的一个缩影。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屠格涅夫的笔墨经济。

罗亭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罗亭的形象还是令人感到亲切。这不是因为他的爱情故事,而是由于他的人生理想。人应该如何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罗亭以自己的坎坷的生活道路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而这个答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陈 肇

1963.11.

是一个宁静的夏日的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晴朗的天空，但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从醒来不久的山谷里送来阵阵清新的芳香，在还是带露的、没有喧声的树林里，早醒的小鸟在快活地高唱。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小山坡上，从上到下遍地都是刚刚扬花的黑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一个少妇正沿着窄窄的乡间小道向这个小村走去。她身穿白色薄纱长衣，头戴圆草帽，撑着小阳伞。一个小僮远远地跟在她后面。

她悠然自得地走着，似乎在领略散步的乐趣。四周是高高的、摆动的黑麦，连绵的麦浪带着柔和的沙沙声起伏着，时而泛着银绿，时而皱起略带红色的微波，云雀在高空啾鸣。少妇是从她家的村子出来的，这村子离她现在要去的小村相隔不过一俄里^①。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是个相当富有的寡妇，没有子女。她和她的弟弟，退役的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里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她管理产业。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在村头一座破旧不堪的、低矮的小屋前站住。她把小僮叫过来，让他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健康情况。小僮很快就出来了，一个胡子雪白的衰老的农民陪他一同走出来。

① 1俄里合1.06公里。

“喂，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她还活着……”老头说。

“我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小屋。屋里很窄小，烟雾腾腾，令人感到闷热……火炕上有人开始蠕动，呻吟起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环顾了一下，在昏暗中看到一个老妇人的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那老妇人头上包着格子布头巾，一件沉重的粗呢大衣一直盖到她的胸口，她困难地呼吸着，无力地摊开两只骨瘦如柴的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跟前，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烫得厉害。

“你觉得怎么样，马特廖娜？”她向火炕弯下身子，问道。

“哎哟！”老妇人仔细看了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了一声。“不行啦，不行啦，我的亲人！我的大限到了，我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马特廖娜，或许你的病会好起来。我叫人送给你的药，你吃了吗？”

老妇人伤心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楚问她的话。

“吃了，”站在门边的老头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转过脸对着他。

“除了你，她身边就没有别人陪她吗？”她问。

“有个小妞，是她的孙女，可是她老要跑开一刻也坐不住。连拿点水给奶奶喝，她都懒得干。我又老了；能有啥用？”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

“不用！干吗送医院！反正是要死的。她也活够了；可见，这